

南京坠落钢管砸晕农民工



8月31日清晨,江苏南京,农民工装修被坠落钢管砸晕。

清晨7点,秦淮区明瓦廊迷8酒店正在装修时,两米高处一根钢管坠落砸到一位农民工头部,农民工从脚手架摔下昏迷不醒。

报警后,110、120到场将其送八一医院抢救。经了解,该男子40岁,姓刘,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提醒,施工时佩戴安全头盔可以避免受伤。

金奇/CFP

山东高青有个“言灵”调解室

不少农民工前去调解,涉及

土地、婚姻、医疗、交通等问题

本报讯(通讯员李锋 李晋)“你们就为了孩子打架这点小事,双方到现在还在闹矛盾。对方愿意和解,提出给500元,并当面向你们赔礼道歉。”“咱不蒸馒头争口气,既然人家有诚意,咱也没话可说。”

9月7日,山东省高青县司法局干部董延玲来到温泉乡建设工地胡志功的宿舍,针对胡志功和工友两孩子打架引起的纠纷去做当面调解工作。

2013年,胡志功的儿子和工友的孩子玩耍时,年龄较小的胡的儿子被对方无意中弄伤,共花去检查费、医药费等800多元。双方多次调解无果,最终闹到要“对簿公堂”。法官劝他们说,打官司成本高,找“言灵调解”可能效果更好。

2013年,获得“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称号的司法干部董延岭在单位帮助下成立了一个由她名字谐音命名的调解工作室。董延玲在做通一方的工作后,自己又骑车来到胡志功家,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许多矛盾纠纷往往由一些鸡毛蒜皮小事引起,可如果不及时调解,小事也可能演变为大事。”董延玲说。

董延玲他们创新性地提出“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工作模式,就是矛盾双方在调解之下成功和解,达成调解协议,且自愿申请法院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审查确认。董延玲说,这种模式的创新优势在于以司法确认的形式提升了调解工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经司法确认过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执行力。

“言灵调解”现在已成了一个品牌,不少农民工就冲着“言灵”这块牌子找上门去调解,涉及土地、婚姻、医疗、交通等方面的问题。因为实在“调”不过来(去年调解340余件),最近他们又招募了20名善做群众思想工作的志愿者。

重庆一农民工助人为乐,好事足迹遍及浙江永康每个乡村

因做慈善打工11年无积蓄

组建服务队带领更多人,“献出一份爱心,就能减少一份苦难,多一张笑脸”

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实习生 周洋

长年体力劳作,让吴安建看起来很魁梧。黝黑的皮肤,绿白相间的衬衫,宽大的亚麻裤以及脸上坚韧的神情……这一切,见证了这名重庆汉子“别人有难我心痛”,好事足迹遍异乡的善良情怀。

8月下旬,跟随重庆市委宣传部组织的“逐梦他乡重庆人”采访组,《工人日报》记者来到浙江永康市。“他好出名的,很多本地人一听到我是重庆的,都说重庆人好,就因为吴安建在这里做了那么多好事。”接待记者的新永康志愿者服务队重庆老乡蔡大哥甫一见面就这样对记者说。

1965年出生于重庆南川的吴安建,2004年和妻子前往浙江永康打工,目前在永康市健力工具厂世雅门市部做销售员。11年来,吴安建把省吃俭用的9万多元全部捐给当地需要帮助的人。如今,在永康人心中,“吴大叔”已成为慷慨、热心的代名词,大家都称赞他是“十佳新永康人”。

打工11年竟无一点积蓄

2004年,在老乡推荐下,吴安建带着老婆,来到永康一家五金件厂做工,并在厂里

认识了同为打工仔的河南人刘震启。11年过去了,刘震启有了自己的五金加工厂,吴安建却依然蹬着三轮车,四处送货,和老婆住在单间配套宿舍内,睡在几块木板搭建的简易床上。

这些年,吴安建没有存下多少钱,老家建房,他还欠下十几万元的外债。即使这样,吴安建仍然选择坚持。吴安建一直没把自己做的事告诉妻子女儿,一瞒就是7年,直到2013年浙江各大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让他“现了形”。

对于“蜗居”,吴安建说不付房租就好,“我的工资拿去帮人,家里欠的债就由妻子女儿挣钱还。”据当地媒体统计,直到2013年,光是现金资助,吴安建就付出了9万余元。

“我们最初都很不理解他的做法。”曾经与吴安建一起在五金厂打工的工友刘振启说,前几年,吴安建借钱整修老家的房子,至今还有七八万元的债没还。“我的身体好着呢,欠的债可以慢慢还。但是要是把自己的债还完再去帮助那些困难的家庭,可能就晚了,他们等不起!”吴安建说。

帮助别人自己就会快乐

到永康不久后,一起打工的同事老周突然死亡,吴安建就想去慰问下老周家里的人。

在那个乡村的土房里,老周重度残疾的妻子与正在读高三的儿子相依为命,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由于父母过早,他只上过3年学,“看不得孩子读不起书”。吴安建觉得一定要做些什么。

于是,一个月1000元工资的吴安建借了3000元,加上500元存款,一起交给了老周的妻子。随后,他一边还债一边四处申请资金,硬是帮助小周考上大学并顺利毕业。2013年,大学毕业找到工作的小周想要回报吴安建,被他拒绝了,他反而劝小周去帮助其他学生。

老周的事,让吴安建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中。2013年9月,吴安建从报纸上得知,当地有户程姓人家,父母已七八十岁,两个儿子都得了肺结核,家中不仅无钱治病,连15岁孙子的学费都交不起。

程家的孙子阿岗正在念高中,为了不让两位老人操心,吴安建特别嘱咐阿岗的老师,今后孩子的事情可直接给他打电话,只要自己能办的,都会尽力办好。9月底,他接到阿岗的电话,称父亲没了。听到阿岗的哽咽,吴安建担心孩子因此失学。他赶紧告诉阿岗:初三及高中的费用,吴叔叔包了。

除了给自己留一些伙食费,吴安建将剩下的钱都用来帮助别人。在他的带动下,有些打工者跟着他一起做好事。重庆老乡发生



留守老人的家当

浙江丽水青田县万阜乡,傅客图,男,83岁,王葱花,女,78岁,儿女们都在外面打工。背后的小楼和院子里的物件就是这两位老人的全部家当。

青田县被称为华侨之乡,而现在的农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家外出打工,他们的父母固守在家乡,伴随着衰老的是孤独和病痛。

虽然相关部门已开始重视空巢老人这个群体,也出台了帮扶方案,但这些方案还没有完全覆盖到他们身上。今年,据民政部统计,中国农村留守老人数量已近5000万,农村养老服务问题日益严峻。

李中/CFP

本报记者 高柱 李娜

“孩子2岁半我就出来打工,今年她已经8岁了,这么多年都没能陪在身边看着她长大……”8月27日,在蓝领工人亲子夏令营现场,9组农民工家庭的孩子和父母共同享受着难得的亲子时光,看着自己的孩子围在身边蹦下跳十分高兴的样子,聂芳心里感慨万千。

30岁的聂芳来自湖北孝感市云梦县农村,现为中建钢构西南大区项目工地上的一名下料女工,她告诉《工人日报》记者,自2009年与老公一起出乡务工,至今已经辗转全国多个省市,一年中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能回老家和女儿团聚。“孩子长得可真快,一年一个样,记忆里还是小时候的模样,今年却都

要上小学了,只可惜我没能陪她一起长大。”说到这里,聂芳低下头偷偷擦拭已经流下的泪水。

据介绍,参加亲子夏令营活动的9组农民工都是异地在川务工人员,为了让孩子们在暑假的最后阶段能够获得父母团聚的机会,中建钢构有限公司西南大区在8月25日分别从云南、贵州、武汉、湖南等全国各地多个城市将孩子接到成都,安排孩子们走进车间厂房参观,了解父母在外的工作和生活,

还组织所有农民工家庭到四川科技馆、极地海洋世界、蝶彩花卉基地等地免费畅游,同时还开展了创意厨房大比拼等形式多样的亲子活动。

“这次夏令营活动对我们父母和孩子而言都是太珍贵的记忆了!”车间剪板工肖伟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他的儿子今年已经7岁了,自己却从来没有像在夏令营中这样陪孩子玩过一次,“有时候连孩子喜欢什么、讨厌什么都搞不清楚,觉得亏欠他太多了!”

打工者坦言心中亏欠:鲜有陪孩子的机会,连孩子喜欢和讨厌什么都不知道

“对不起,没能陪你一起长大”

当天活动结束后,孩子们不得不面对和父母的分离。聂芳的女儿舒佳怡返程火车的时间最早,所以需要先行离开,而由于聂芳所在项目工程任务十分紧张,女儿则由丈夫送回湖北老家。离别之际,成都小雨淅沥,聂芳撑着伞目送女儿,佳怡则依偎在爸爸怀里,紧紧抱着在游戏环节中与妈妈一同赢得的玩具小熊在车上暗自啜泣,感受到来自爸爸的安慰,佳怡泪眼婆娑地抬头问道:“爸爸,妈妈不可以和我一起回家吗?”见爸爸无奈摇头,稚嫩

的声音带着失落,“好吧,爸爸妈妈是为了我,才一定要在外面工作……”

据2014年相关数据统计,全国农民工总量27395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总量16821万人,全国留守儿童总量为6100万人。而《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调查结果显示,约15.1%、近1000万留守儿童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即使在春节也无法团聚;有4.3%的留守儿童甚至一年连父母电话也接不到一次。

职业病的前期预防(二)

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

什么是“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制度”?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制度是指: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国家对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的防护设施设计有何要求?

我国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分为职业病危害轻微、职业病危害一般和职业病危害严重三类。

《职业病防治法》第十八条规定: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的防护设施设计,应当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查,符合

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方可施工。

国家对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前和竣工验收时有何要求?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具体要求是:

(1)对建设项目存在的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或有害物质的浓度、强度进行测定、评价;

(2)对除尘、排毒、通风、照明等各种职业卫生防护设施及辅助设施的防护效果,应急救援设施和职业卫生管理状况进行评价;

(3)在竣工验收时,其职业病防护设施需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生产和使用。

什么样的机构可以承担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

经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或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发证认可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方可承担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和控制效果评价。

国家为什么对从事放射性、高毒、高危粉尘等作业实行特殊管理?

从事放射性、高毒、高危粉尘等严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对于劳动者具有更

大的危害性,容易诱发职业病的发生。考虑到放射性、高毒等作业的危险性,国家需要采取不同于一般职业病防治的特殊管理办法,对这些作业的职业病防护工作制定更严格的标准,对放射性、高毒作业实施特殊管理。

高危害粉尘作业指的是接触粉尘的高度危险性作业,如接触石棉粉尘和含游离二氧化硅10%以上的粉尘、可能导致尘肺病“高发、群发、速发”的粉尘作业。高危害粉尘作业对作业人员的危害十分严重,对高危

粉尘作业进行特殊管理,有利于有效解决尘肺病高发的问题。

哪些毒物属于高毒物品?

2002年国务院发布《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将有毒物品划分为一般有毒物品和高毒物品,并对高毒物品管理作了相关的原则规定。之后,卫生部颁布了《高毒物品目录》,列出了54种高毒物品,包括:

(1)《作业场所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MAC<1mg/m³、PC-TWA<1mg/m³的有毒物质、被IARC认定的人类致癌物,共36种;

(2)MAC>1mg/m³或者PC-TWA>1mg/m³、但职业病发病居前十名的有毒物质共18种。